

在新兴中产阶级的推动下，私营企业对中东地区顺利的民主过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以



突尼斯马赫迪耶的一家基里姆毛毯店。

瓦里·纳萨尔

“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地是突尼斯，而非叙利亚或也门，这并非事出偶然。

突尼斯之所以成为导火索，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对繁荣和增长充满了期望，是因为该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是因为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持有相对自由的政治观点并渴望获得伴随经济繁荣而生的政治自由。

在政治稳定、经济活动开放的环境中，私营企业往往会蓬勃发展，经济也出现增长势头，从而为中产阶级的涌现提供支持。中产阶级的兴起又可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民主进程。

如果中东地区意欲实现“阿拉伯之春”催生的民主希望——而且如果世界其他地区想要享受其所获得的全球化利益——该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国家必须培育私营企业，并催生一支庞大且能够畅所欲言的中产阶级队伍。

肥沃的土壤

当突尼斯于2011年1月爆发全国性游行示威之时，该国的经济十分开放且颇富生机。该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具有熟练的技术——20%的人口使用脸谱网与国内外的家人和朋友交流。

在发生“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前的10年中，突尼斯被人羡慕地称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尽管该国实施独裁统治且备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是，通过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该国还成功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而且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与那些大型的新兴经济体相媲美。快速的经济增长催生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最终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推动力。

阿拉伯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均遭受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导致大量臃肿的程序性公共部门



往



的产生，在政府保护和高关税壁垒的作用下，这些公共部门抑制了人们的创新和创业欲望，同时也对效率低下的部门提供了保护。

因此，阿拉伯世界落在了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后面。僵化的制度加剧了贫苦和人们心中的挫败感。该地区人口的“年轻人暴增”现象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

假如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如果阿拉伯世界未能效仿东欧、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经济体实现成功过渡——则该地区的民主未来不仅将夭折，而且还将变得更加贫穷和不稳定。这将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而给全球安全 and 经济繁荣造成威胁。

最为明显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幽灵，但是，手足相残的地区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及面向欧洲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也是令人担忧的威胁。

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

如今，阿拉伯人口达到4亿，到2050年，将增加一倍至8亿。人口的增长使得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成为该地区一项迫在眉睫的目标。抛却上述目标不谈，即使停滞不前并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阿拉伯经济体也将需要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9%—10%的“虎体经济体”(tiger-economy)增长速度。这无疑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单凭公共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经济增长必须源于私营部门，而此举需要对经济实施改革：取消监管、放松政府管控、促进贸易并强化法律法规。

毋庸置疑的是，该地区的私营部门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的开放——主要由突尼斯、埃及、阿联酋、约旦和摩洛哥实施——及由高油价所导致的新技术和资本的大量涌入促使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这些新生企业既涵盖了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又涵盖了新创建的行业，如新兴技术型企业。其中的一个范例便是雅虎于2009年8月以1.2亿多美元收购约旦创新网络公司Maktoob。

正是由于中小型企业积极从事此类经济活动，我们才能够无视该地区当今暗淡的局面，对切合实际的经济变革踌躇满志。迪拜、马来西亚及土耳其所实施的经济改革，诸如埃及、巴基斯坦及约旦河西岸等地区政府管控的稍许宽松，均为当地的商业和国际贸易拓展了空间，即使幅度仍显得捉襟见肘。当地的企业家和商人开始不失时机地对此类变革加以利用。

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持续增加的效果之一是催生了数量不多但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队伍。20世纪60年代，在较大的穆斯林国家中，如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平均不到总人口的1/3，而且据估计，中产阶级最多仅为5%左右。而如今，这些国家约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中产阶级约占10%。

如若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级，将拥有正式工作、具有稳定薪水和福利且其1/3的收入可作为自由支配开支的人归入中产阶级，则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可分别约占其总人口的15%和30%。如若进一步拓展此种定义，将具有现代家庭生活价值观的人纳入其中，例如希望少生孩子并为其未来发展而不惜投资等，则这一数字甚至更大。据估算，多达60%的伊朗人已然或即将踏入中产阶级队伍。

中产阶级兴起的迹象及由此推动的资本主义浪潮在中东各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遭受革命席卷的开罗、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及备受制裁的德黑兰也屡见不鲜。尽管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看似前景黯淡，但在过去10年中，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开始出现振兴的迹象。此类经济活动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总体经济态势，但的确呈现了某种势头，并使人们看到变革的可能性。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实际GDP增长了3.7%，与此前10年相比增加了0.7个百分点。

中产阶级企业家是其所属国家状况改善的最大希

望，同时也是抗击极端主义、争取民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数量有限的中产阶级所依赖的是国家发放的薪水和保障的权益，极少与自由市场建立联系。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为当地企业家的日益增多提供了支持，此举可有助于改变上述情形。

这些力量已然产生了某种影响。2009年的伊朗大选骚乱便是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抗争的结果，旨在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内贾德极力谋求强化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起源于中产阶级谋求政治变革的努力，以满足该群体对文化和经济方面所抱有的期望。正如土耳其凭借其中产阶级推动自身改革，成为一个成功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并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一样，阿拉伯世界也同样可以利用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人们创业的热望来实现增长。

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的前景颇具吸引力：通过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中产阶级还可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中东地区位于更大范围的穆斯林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穆斯林世界在改革面前正蓄势待发。随着15亿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日渐提高，他们将要求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一些人将购买具有明显伊斯兰特征的商品：不仅仅是清真食品和头巾，而且包含伊斯兰银行服务、教育、娱乐、媒体和消费品。

伊斯兰金融业的振兴

消费者的此类需求已经在全球市场中掀起了波澜，从伊斯兰金融业（金融服务遵守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的伊斯兰规则）的振兴可窥一斑。此类服务的增长正在使得中东地区更加紧密地与全球经济实现一体化。尽管伊斯兰金融业仍然是一个利基市场——伊斯兰债券市场（市值接近1,000亿美元，在全球债券市场中仅占0.1%）及超过75个国家中的约300家伊斯兰银行和投资公司所监管的银行业服务价值数千亿美元——然而一些人估计，到2015年，该行业的资产将增长至高达4万亿美元。

该新生中产阶级中的一些成员是旧官僚的子女，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均来自乡村和较低社会阶层。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子女利用现代经济体制一跃成为中产阶级。许多人对于他们的宗教十分虔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及愿景使其与极端主义分子截然不同。毕竟，拥有财富的人能够更加洒脱自如地消费，他们往往具有自由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并且对世界事务兴趣盎然。

这并不是说中产阶级穆斯林恐怖分子将不复存在。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颇为相似的是，

恐怖主义将不再引起真正融入世界的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兴趣。那些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利益攸关的人将不会支持可危及自己未来的破坏性想法。许多穆斯林对西方世界产生的疏离感和愤怒是历史积怨的产物，但他们与全球经济的隔绝无疑大大加剧了这种疏离感和愤怒。如要改变这种局面，许多穆斯林必须向前看而不是抱住历史不放。这些“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振兴是一项必然的趋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蕴含的力量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绝不次于极端主义。而且，它无疑是彻底改变穆斯林世界思想观念的关键所在。

突尼斯或开罗的商人是否将掀起一场全面的革命，从而实现阿拉伯政治的民主化——类似于四个世纪之前荷兰新教主义者所发起的那场历史性变革，现在做如此的推测为时尚早。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由企业家推动的资本主义的稳步发展是真正实现中东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西方利益

全世界正在饶有兴趣地关注“阿拉伯之春”取得的成功。假如这场变革没有将中东地区推向繁荣和民主的道路，则不断恶化的不稳定政局和肆虐的极端主义将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冲击。

如今，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不断蔓延，对其发挥遏制作用的将不是那些开明的牧师或自由主义改革者，而是企业家和商界领袖。这对西方政府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启示作用。当价值观服务于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时，可带来可观的收益，而当持有此等价值观的人获得权力时，这些价值观将塑造国家的行为。

在资本主义取得发展之后，欧洲民主的胜利便接踵而至。迄今为止，温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仍未被中东地区完全接受，这不仅因为伊斯兰宗教的根本性质所致，而且由于领导这一潮流的商业阶层仍然势单力薄。帮助这个资产阶级壮大队伍并在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是确保民主价值观生根发芽的最佳途径。

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扩大与该地区的贸易。为了保护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利益，西方已经牺牲了众多的生命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西方国家与这个地区（土耳其除外）开展的实际商业活动微乎其微。除石油和武器销售之外，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仅仅是与拉丁美洲、东欧或印度之间贸易额的一个零头。如今，美国与约旦和摩洛哥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而欧洲也正在考虑与地中海边缘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这些无疑是积极的措施，但在西方商场的货架上，阿拉伯世界制造的商品仍然乏善可陈。

西方政府似乎理解企业创办、商业和开放市场对阿拉伯世界未来的重要作用，但却根本没有促进经济变革的机制。官僚规则阻碍了中小企业的金融投资——美元仅仅投入到了非盈利的企业之中——而且缺乏协调一致的力量推动政府实施改革。对经济变革的讨论滞后于政治议题。

在一定程度上，鉴于其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成功，中小型企业仍然是该地区的希望之星，也是国际



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的前景颇具吸引力：通过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中产阶级还可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该地区经济愿景的希望所在。但是，这种愿景也基于如下信念，即该地区仍然拥有充足的资本——来源于当地的投资者，与西方投资者相比，他们在面对政治风险时要更加灵活自如。正是这些充足的资本才使得该地区保持了生机和活力。此外，人们还希望，执掌大权的新生代领袖们将会抱有亲商主义的态度。在最近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把自己塑造成为“埃及的埃尔多安”（系指深受人爱戴、利商的土耳其总理）。而备受人推崇的看法是，穆斯林兄弟会商人群体将会推动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政党采取商业主导经济增长的措施。

稳定与改革

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中小型企业可以做些事情——实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新生民主国家中奏效的一些做法。但是，这必须以两个根本性因素为前提：政治稳定和彻底的经济改革。

在该国恢复法治之前，很难想象投资者会回到埃及，而一旦街头骚乱结束，政府稳定便指日可待。但是，商业的振兴还需要获得如下保障，即劳动工人结束罢工，政府强制实施并守护劳动力市场规则以及政企关系处于稳定和可预测的状态。

阿拉伯世界可能拥有充足的资本，但如果工人罢工影响到经营，工资份额致使盈利减少，且商业的增长前景持续笼罩着不稳定的阴云，那么，这些资本不太可能投入到这些国家的企业之中。在重大变革席卷

该地区之后，可以预计的是，将会出现某些政治不稳定因素。尘埃落定、恢复秩序和稳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其中一些政治骚乱发生的原因是经济体弊端重重。

以埃及为例，在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一年之内，埃及的经济萎缩了0.8%（以2011年为基准），制造业下降5.3%。失业率攀升至12%（年轻人失业率为25%）。国内私人投资下降了10.5%，外国投资跌至谷底——从2010年的64亿美元跌至2011年的5亿美元。2011年下半年，国内外投资的暴跌使政府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国外入境人数下降了约35%——对于一个旅游业占GDP11%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政府的预算赤字迅速增加至110亿美元（占GDP的10%，位居阿拉伯世界之首）。加上资本出逃——由于持续的政治不稳定，出逃有增无减——外汇储备急剧下滑，从430亿美元的高位跌至150亿美元。每五个埃及人中有两个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因此，此类事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毫无疑问的是，为了解决这项挑战，需要实现经济稳定。这正是西方列强在2011年八国集团（G8）多维尔峰会上所作出的承诺。但是，稳定仅仅能够提供稍纵即逝的利益，还不足以完全逆转一直困扰该地区并加剧其治理和经济危机的趋势。

清晰的未来之路

经济改革和民主化需要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商业的活力。中小型企业必须凭借足够强大的增长主导这一过程，以确保阿拉伯国家成为成功摆脱各种问题的新兴国家；只有到了那时，民主才有机会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如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所有最近获得成功的民主化均与经济重组密不可分。国际金融机构与西方政府和私人捐助者携手合作，为彻底的改革提供资本，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种合作关系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得以最终确定。培育增长和民主的这项战略备受诟病，它并不总是能够奏效——或者效果十分完美——但是如若没有这项战略，大多数的民主努力均将功败垂成。

阿拉伯世界呼唤一个全新的“华盛顿共识”的诞生：实施改革、提供资金以促进改革的清晰战略。这是为企业增长营造恰如其分的环境和提供充足资本的最佳途径。■

瓦里·纳萨尔（Vali Nas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也是即将出版的《可有可无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收缩》（Dispensable N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treat）一书的作者。